

焦裕禄严守党纪的故事

□ 张 龙

焦裕禄，一个在神州大地上家喻户晓、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在焦裕禄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严守党的纪律、对党忠诚，为每一名共产党员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坚持党的领导

坚定跟党走，是焦裕禄始终不变的初心。1945年8月，焦裕禄从宿迁返回家乡，加入村民兵组织，参与了家乡的解放。在党的教导下，结合对旧中国和自己一样劳苦大众苦难经历的思考，焦裕禄迅速成长起来，他三写入党申请书，向党组织表达了入党的愿望。在入党登记表中，焦裕禄写下了自己的誓言：在党的领导下为彻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贡献一切。在工作中，他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执行党的决定。

焦裕禄坚持用党的理论武装自己。到兰考工作时，他随身带来了《毛泽东选集》。无论在办公室还是下乡工作，他总是把《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县委常委会上，他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工作遇到困惑时，他反复研读毛泽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他曾深有体会地说：“干劲不足的时候查思想，思想不通的时候，就要加紧读毛主席的书。”焦裕禄病逝后，工作人员在整理其遗物时，在他枕边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焦裕禄高度重视政治教育，常常告诫党员干部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1963年4月1日，兰考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焦裕禄起草了《中共兰考县委要求全体党员坚定地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其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令，要努力学习党章、党纲和党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焦裕禄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他都全力以赴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是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典范。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尉氏县成立了支前总队，焦裕禄

服从组织安排，担任彭店区支前大队长，带领彭店区1000多人的队伍开赴前线，顶风冒雪、涉水蹚泥，冒着生命危险推着独轮车运粮拉伤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党需要大批优秀干部加强工业建设。同年7月，焦裕禄服从组织安排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从农业战线到工业战线，行业跨越较大，但焦裕禄没有畏缩，决心从头学习相关业务知识。在洛矿9年工作时间，焦裕禄和工友终于成功研制出全国首台新型直径2.5米双筒提升机，填补了我国矿山机械生产的一项空白。

1954年8月，焦裕禄等5人作为工业农业战线抽调的干部到哈工大深造。当时由于基础薄弱，焦裕禄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但他迎难而上，废寝忘食地进行钻研，经过半年努力，焦裕禄顺利完成了速成班的学习任务。但是，就在校学习即将安排他和同事转入本科学习时，洛阳矿山机器厂投产时间突然提前，他们接到立刻回厂上班的通知。焦裕禄心有不舍，但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并给大家做思想工作，很快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继续工作。

20世纪60年代，兰考县处于“三害”严重时期，当地委组织部同志和焦裕禄谈话时，明确告诉了他兰考的困难情况，要他在思想上有个充分准备。焦裕禄态度十分坚决地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廉洁奉公不谋私利

焦裕禄的一个妻侄原来是一名工人，1959年至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下放回家，没有了工作。焦裕禄到尉氏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后，焦裕禄的妻嫂多次找他要求给孩子安排一个工作，每次焦裕禄都说不行。一次，焦裕禄的妻嫂找到焦裕禄，直接追问：“孩子的事行不行你说个干脆话。”焦裕禄坚定地回答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决不能光考虑自己的事，自己要和群众一样对待，政策允许我还能不办？政策不允许，让我办也不能办！”妻嫂理解了焦裕禄说的，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提给孩子安排工作的事情。

1963年1月，临近春节时，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给焦裕禄家送去几斤肉。焦裕禄问道：“人人都有一份

吗？”那个同志说：“春节快到了，书记们工作忙，顾不上打肉，这是特意照顾几个领导的。”焦裕禄说：“我家的肉已经买好了，你回去看看办公室谁没买肉就给谁吧。”他还叮嘱那个同志，以后不要再单独照顾领导了。1月19日，焦裕禄为了让兰考的党员干部勤俭过春节、廉洁过春节，就亲自起草了《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勤俭过春节，防止浪费的通知》。

时刻想着群众利益

焦裕禄高度重视群众纪律，他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1963年1月中旬，焦裕禄下乡回到兰考县委后，看到墙上的救济名单有自己的名字，便找到机关党支部书记问明情况，要求去掉自己的名字，并以此召开机关党员大会。他说：“兰考是个灾区，人民的生活都很困难。我们时时、事事应该首先想着群众。我们是共产党员，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可自己苦一些，也不要随便要国家的救济。我们是县委机关，应给全县干部做出榜样。”最后，相关部门又重新评定了救济人员，重点照顾了8位困难最大的同志。

1963年12月9日，北风刮了一夜，大雪下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焦裕禄就把同志们叫起来开会。他说：“这场雪越下越大，它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大雪封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去。”吃完饭，他带领同志们冒着风雪下乡。他还忍着肝疼，一天跑了9个村，慰问了几十户困难群众，没喝群众一口水，没烤群众一把火。

工作中严明纪律

焦裕禄赴任兰考时，当地连年灾荒，风沙、内涝、盐碱“三害”肆虐，部分干部的思想较不稳定、战胜灾害的信心不足，还出现了少数干部以权谋私的现象。为改变这种情况，焦裕禄一到任就把严明工作纪律放在了突出位置，并且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1962年12月24日，在县委扩大会上，焦裕禄明确强调，各级党委和各部门负责同志，要模范地执行党的

纪律，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生活不能搞特殊，家属也不能特殊。他还要求，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要发扬革命的爱友精神，互相监督，防止犯错误，原则的问题要坚持斗争、生活细节的问题要互相关怀。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1963年1月1日，焦裕禄收到群众来信，信中反映城关区盆窑公社个别干部的问题。为了核实来信反映的问题，焦裕禄亲自前去调查。通过调查，焦裕禄发现一些干部确实不执行按劳分配政策，有的严重贪污多占，甚至放高利贷雇工剥削，损害集体利益，严重挫伤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焦裕禄立即会同区、社党组织进行了认真处理。第二天，焦裕禄要求把查清的问题以及处理情况通报全县，以教育全体干部群众。

生活上严格自律

在日常生活中，焦裕禄对妻子和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刚到兰考工作时，焦裕禄的妻子和儿女都跟着他住在县委大院。有一次，他看到妻子到县委食堂提了一壶开水，就把妻子严肃地批评了一顿。焦裕禄说：“这个开水，你提了用，你可是方便了，但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不能带头破坏了办公的秩序。”一壶开水事小，但这件事又使他意识到，干部家属住在县委大院可能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因此，经他提议，所有住在县委大院的家属全部搬了出去。

1963年11月14日，城关镇渔场一位同志给焦裕禄家送去10条活鱼。想着味道鲜美的鱼肉和鱼汤，焦裕禄的几个孩子非常高兴，等着焦裕禄回家发话吃鱼。焦裕禄回家后看到了活鱼，觉得奇怪，便向妻子和孩子们问明情况，他对孩子们说：“鱼塘是集体的，这些鱼是叔叔们辛勤劳动养大的，咱们没有劳动，不能要，想吃鱼明天赶集去买。”几个孩子明白了爸爸的话，都懂事地点点头，把10条鱼送还了渔场。

（作者系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焦裕禄精神研究院研究员）

红色记忆

船行南长河

□ 王永武

五月的北京，夏意渐浓。草木早已复苏，长满绿油油的叶子。各式各样的花儿，争先恐后地吐蕊争艳，不仅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也装扮着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5月8日，我和50多名同事一起参加了一场由工会组织的海淀文博行主题活动，乘船沿着历史悠久、风景如画的南长河，感受北京这座都市古朴沧桑的文化韵味和现代生态文明的脉动。

中午气温升至30多度，我们顶着烈日骄阳，来到位于北京动物园内的游船码头。站在南长河岸边远望，两岸长满了柳树，长长的柳条婀娜多姿，随风摇摆。这些柳树与天坛的松树齐名，老北京城里有“天坛看松，长河观柳”的说法，这段南长河就是最佳观柳处。

北京的长河起源自西山山麓，通过昆明湖至海淀麦庄桥，折向东南，至西直门高粱桥并自此汇入德胜门水关，进入积水潭，全长30余里。以瓮山泊为界，上溯到玉泉山段称北长河，瓮山泊至高梁桥段称南长河。明清两代皇室出游到西郊苑林行宫，一般都是乘车轿出西直门，从高梁桥西面的码头换舟，靠纤夫拉至西部行宫。因此，这段南长河也被称为“皇家御河”。

我们登上了装饰古朴典雅的游船，船身缓缓地在水面上划开，激起了一层涟漪。随着船的前行，两岸景色也逐渐展现在眼前。阳光洒在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两岸柳树随风轻摆，仿佛向我们挥手致意。船下河水清澈见底，偶尔可见鱼儿在水中嬉戏，水草中被惊起的野鸭飞掠过水面，为这古老的长河增添了一抹生机，让人体会到诗句“长河雨后波生涨，趁爽分明好进船。柳絮忽闻嫩黄响，始知复育化成蝉”中的意境。坐在船舱内，透过窗户观赏着沿途风光，沉浸式体验着“船在河中走，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心中涌起一股宁静与愉悦。

船过了动物园，前面河道北侧的道路就是入选2021年度十大“北京最美街巷”的五塔寺路，因明代五座小型石塔坐落于此而得名。说起这个“网红”打卡地，我和同事们都很自豪，因为我担任过这段河道的“河长”，曾与同事们一起参与河道和道路的改造提升工程：在这段长度870米的河道上修建10处景观码头，其中4处码头探出河岸；将河道护坡改成了游河步道，河上建造起3座廊桥。这样加上原有的白石桥和动物园北门石桥，不足千米的河道上有了5

座小桥，形成如今两岸杨柳依依、小桥流水的景致。南长河一桥一景，甚至一草一木我们都很熟悉，虽然在古老的北京城里似乎算不上特别的景观，但在我们眼里，就像欣赏自己的女儿一样，从呱呱坠地，到蹒跚学步，再到亭亭玉立，越看越耐看，满眼都是爱意，越看心中越是欢喜。

不知不觉中游船抵达白石桥。这座桥是北下关街道和紫竹院街道的分界线，南北耸立着首都体育馆和首都滑冰馆，穿过白石桥，对面南北分别是紫竹院公园和国家图书馆。

船进入紫竹院园内，行至广源闸，我们看到了这座古老的水利工程。据周梦弼著《水部备考》中记载：广源闸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当时修建的闸桥不能启闭，导致大船无法通行。后来不得不在南岸另外开凿出一条河汉，并建有御船坞，还建有龙王庙。虽然现在的广源闸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功能，但它依然是北京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历史的见证。

如果坐船前往颐和园，还需要在紫竹院的紫御湾码头进行换乘。在紫御湾附近离船上岸，路过新设的闸口，这里代替广源闸调整着长河水位高差。走不多远，就来到另外一处码

头，登上另一艘游船，继续沿南长河逆流而上。上船不久，便看到了耸立河北岸的万寿寺。寺庙建筑金碧辉煌、气势恢宏，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但依然屹立，诉说着历史沧桑。

随着游船的前行，我们也逐渐越过眼前的这些古迹，看到了现代的北京。两岸的高楼大厦、繁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构成了一幅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图景。丛中我看到了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感受到了新时代的强劲脉搏。

沿途又路过麦钟桥、长春桥等码头，经过近1个小时行程，游船到达颐和园南如意门码头，我们完成了此次南长河的水上之旅。站在码头上，回望着这条长河，我心中充满了感慨。她见证了北京城的兴衰变迁，承载了无数的历史记忆。作为南长河的一名普通建设者和守护者，这条古老的河流，将会永远流淌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得我用心用情去呵护。

自得园



墨苑清操

□ 李晓巧 李嘉澍

“墨”是我国传统“文房四宝”之一，在我国古代被长期普遍使用，在书写和绘画上，墨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辞海》对“墨”有注解：书画所用的黑色颜料，用松烟等原料制成。

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中古方以石磨汁……至魏晋时，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夹和为之。”随后出现了墨模，使墨的形式趋于规整，松烟墨逐渐由丸状进而为梃状，更适于使用和欣赏。

隋唐两代有专门负责制墨的墨官，在生产名贵松木的地区制墨。五代十国时期，奚廷珪以黄山松烟为原料，改进工艺，所制之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名闻遐迩，被南唐统治者赐姓李，并封为墨务官，李廷珪墨扬名天下，有“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美誉。

宋代科举兴盛、书画艺术繁荣，文人和艺术家对墨的需求大、品质要求更高，客观上刺激了制墨业发展。宋代制墨分两派，一派是加龙麝助香，另一派是不用香料。并且，宋代出现了油烟墨，数量不多，乃至当时大文豪苏轼也“得油烟墨而宝之”。

明代对墨的配方和品质更加重视，油烟墨制作技艺趋于成熟，而油烟墨占据主流则要到清代康熙年间，“油烟（墨）胜而松烟（墨）遂少”。比较而言，明代墨用料讲究，清代墨则更注重制作。明代墨深厚有力，清代墨柔和精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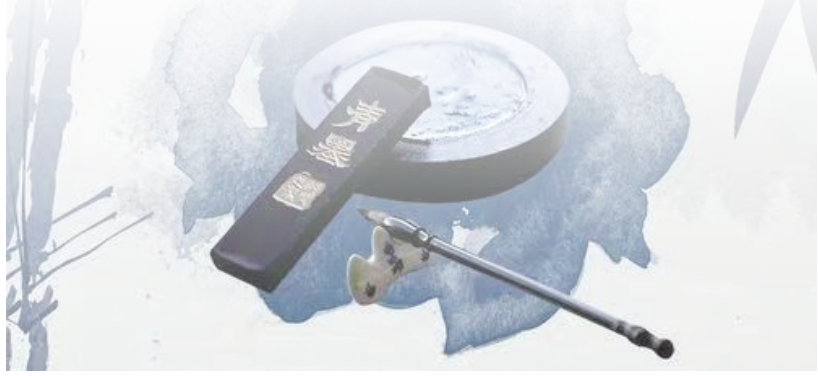
明清两代，制墨名家辈出，明代有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等，清代如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等名气极大。曹素功在康熙帝南巡期间，曾六次去江宁进呈所制徽墨。当时江南地区督抚选墨作贡品，必有汪节庵墨。

在我国古代书画及印刷中，“墨”并非只指黑墨，也指书画所用的其他颜料。《新唐书》记载，三国时期魏国大臣韦述藏书宏富，并亲自标点，“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这里的“黄墨”就是用雌黄研细加胶合制的墨，可用于修改文稿或者点校图书。另一种广泛使用的“朱墨”，是用朱砂研细加胶而成，亦称“硃墨”。明清科举考试中，乡试和会试场内试卷，考生本人用墨笔缮写，称为“墨卷”，为防止徇私舞弊，将墨卷密封糊名，交给誊录人用朱墨笔誊写，称为“朱卷”，送考官批阅。此外，古代还有很多朱墨画。

作为“文房四宝”之一，文人爱墨自在情理之中。苏轼的“雪堂义墨”名气颇大，《清稗类钞》有记载：“昔苏子瞻在黄，于雪堂试墨三十六丸，抡其佳者，合为一品，名曰雪堂义墨。”东坡风范，为后世竞相效仿。文人们不仅寻访佳墨，并且流行互赠好墨。北宋晁冲之还写有《复以承晏墨赠之》的诗文。

藏墨也是古代文人的一大雅好。清代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寅有镌着“兰台精英”四字的贡墨，为藏墨者倾囊乐道。咸丰年间的“墨癖”王灼斋，“所藏谿麝（指墨），自唐以来，可数百计，珍若拱璧，不轻示人”，可惜的是后遇内乱仓皇避难，顾不上身外之物，等到乱后返家，发现“名煤千笥，已融于釜”，王灼斋“抚膺号痛”，痛不欲生。可见，藏墨也需太平之时。

对于藏墨，苏轼有诗说道：“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风霜侵发齿。非人磨墨墨磨人，瓶应未罄墨先耻。”他还言：“‘子不磨墨，墨将磨子。’今昌言草木拱矣，而墨故无恙”。寥寥数语道出了藏墨乃至人生处事待物的一番精深道理。



爱之至深，古代文人自己动手制墨的也不在少数。汉末至三国时期，韦诞所制“韦诞墨”与“草圣”张芝制作的“张芝笔”、左伯创造的“左伯纸”，并称“三绝”。明朝的潘嘉客，安徽歙县人，曾任广州通判，辞官归田后，诗文自娱，制佳墨自用并送友人，其所制墨漆衣光亮可鉴、造型刻画精巧生动，很有名气，有些精品还流传至今。清代康熙朝名臣宋荦，笃学博闻，工书画，诗名享誉清初文坛，他“性嗜墨，珍之如拱璧”，还指导制墨。宋荦任江苏巡抚时，为官清正，口碑甚好，康熙帝赐“清德堂”匾额，宋荦别出心裁地制作“清德堂”墨作纪念。

墨可用，也可观赏把玩，清代文人对集锦墨颇为青睐。集锦墨又称“瑶函墨”“豹囊从墨”，是指由多块墨组合成一套完整的人物、名胜或故事的套装墨。集锦墨创始于明代嘉靖年间，到了清代，制作更为精致华美，如曹素功的“青麟髓墨”、汪近圣的“御制石鼓文墨”、胡开文的“御园图墨”等，乾隆时期出现的反映男耕女织、农业技术内容的《棉花图集锦墨》也极为端雅。

墨，在我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也是学问和文化的代名词，如“墨宝”“墨裁”和“胸无点墨”之类。此外还有一些引申义，如指代书画、泛指黑色，古文中还有“贪墨”之用法，意为贪污。因传统木工所用的墨线，再引出规矩、准则的意思。并且，战国时期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重要学派叫“墨家”。

我国传统文人以墨来表现自我、传达美妙，不只用于书法，且以墨笔绘画，如墨竹、墨梅、墨荷、泼墨山水等。谈墨的专书很多，《墨经》《墨史》《墨苑》《墨谱》……不可胜计，宋荦也有《漫堂墨品》传世。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还有一位名叫麻三衡的抗清义士也写了一部《墨志》书。麻三衡是宣城人，抗清义军水东稽亭岭“七家军”首领。麻三衡“好古墨，藏秦甚富”，据说他藏的一款北方松烟墨，“古香可掬，研之，栗栗起蓝烟”，深为人赏。《明季南略》中载有其抗清义事：“（麻）三衡驻兵稽亭，每战当先，舞大刀陷阵，人多畏之。后以众寡不敌被获，杀于江宁，七家皆死。”麻三衡临刑毫无惧色，作诗曰：“誓存千丈发，笑弃百年头。若水心犹烈，平原志未酬。”尽忠死节的忠义之士又为墨事墨韵增添了令后人称道的传奇故事。